

维特根斯坦的悖论与反讽

刘云卿

维特根斯坦非凡的思想，连同实现这种思想的同样非凡的方式，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。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，诸如对写作的疑虑，无所不在的戏谑，以及对伦理的注重。即便如此，相对于他们的相似，他们的差异也许更为深刻：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，而维特根斯坦则是试图摧毁西方哲学的人，是一个来自“内部”的“侵入者”，并且，其指向也与苏格拉底正相反对：不是绝对知识，而是其反面，是对信仰的绝对启示，或将其遮蔽。这一点注定了维特根斯坦奇特而困难的位置。

—

在没有神的时代做一个渎神者，也许比在沙漠中呼喊更其困难，那也许正是维特根斯坦的位置。这似乎是维特根斯坦与那位希腊人的另一种相似：作为雅典的捍卫者，苏格拉底被雅典处死。如果这看上去像是反讽，那造就这种反讽的正是其意图与努力间的不一致。就维特根斯坦自身而言，反讽并不存在。另一方面，如果维特根斯坦仍然是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，反讽才真正出现：维特根斯坦堪称我们这个“规范”时代最难以规范的人物！这一点同等地适用于其哲学。其实，在何种程度上可将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其个人分开？人与哲学的一致性又何以成其为哲学的一部分，或其反讽？正因为如此，维特根斯坦的设问显得至关重要：“我何以能成为一个逻辑学家，如果我还未成为一个人！”（RW [文献简称，下同]，第 191页）

这种选择是决定性的。它不仅选择了性质（血肉之躯无法选择），选择成为“伦理上的个人”，也选择了象征；它象征着维特根斯坦对伦理、宗教与美的选择，并同时选择它们的不可言说。总之，它象征地预示着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努力，反过来，行动着的个人也为这一努力所象征。因此，维特根斯坦选择的意义远不止于字面，它必定还包括真实可信的生活，难以摆脱的罪恶，以及如影随形的死亡。当然，还有对获救的渴望。除此以外，这种选择无异于选择了他对历史所持的姿态，而处于决定与被决定辩证之中的历史像个人一样地真切，也像他一样地是个象征。在此意义上，作为开端的选择堪称真实与象征的双重开端。有鉴于此，在真实的意义上，一致性乃是题中应有之义，哲学于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但在象征的意义上，一致性存于超越之中。

维特根斯坦奇特的悖论注定将引发出另外的悖论：由于《逻辑哲学论》的缘故（在某种

意义上,《逻辑哲学论》是非人的),人难以与哲学相连,就像难以一步跨上月球一样,但鉴于维特根斯坦的极端立场,人不能不与哲学相连!导致这一悖论的正是《逻辑哲学论》固有的悖论。另一方面,也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持的极端立场方使《逻辑哲学论》得以可能。依据维特根斯坦,伦理、宗教与美不可言说,他同时坚持认为,沉默的《逻辑哲学论》是伦理性的。那么,不能言说伦理的伦理之作何以是伦理之作?如果无以言说,是否可以去做?是谁在做?那是一种行动吗?如果那样,《逻辑哲学论》是否仍旧意味着一种哲学?

尽管《逻辑哲学论》是一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似的“划界”之作,但与前者不同的是,其划界更多是功利性的,它更着重那不可言说的一切。因此,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将《逻辑哲学论》视为一条纲领、一个姿态、一句口号或一道禁令。在此意义上,它成为行动或行动的象征,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,作为个人的维特根斯坦成为这种行动的承担者。如果这种解释能被接受,悖论将不会出现,人与哲学的一致也因此得以实现,但这样的话,维特根斯坦传奇般的思想将成为一部平庸传记的素材。不仅如此,由于维特根斯坦坚持在哲学框架中做出理论说明,加上他所作说明的方式,这种解释变得可疑。此外,试图在哲学之内消解哲学仍旧还是哲学,这使行动化的《逻辑哲学论》残存为一种理论。即使作为行动,那也是无人的行动,因为“唯我论”表达了个人,同时也取消了个人;而诞生于历史的《逻辑哲学论》拒绝了历史,代之以“从永恒的视角”;最后,宣称伦理与宗教的不可言说成为超乎这两者之上的宣称。于是,人与哲学的一致就此被一条深渊阻隔。维特根斯坦开端的双重性以让人目眩的速度被摆至其中的一极;真实与象征均为象征取代。但失去真实的象征已不再是象征,当然,也不再是真实。只有美,或只有“先验性”留存了下来。

就这样,起于最简单的意图,却终于含混的托词,并且,其攻击性的姿态使《逻辑哲学论》显现为掩体,事实上,那是自我隐遁之所(“只有当我能够使自己独立于世界——它仍在某种意义上实施统治——只有这时,我才能避开所发生的影响”[TB,1916年6月11日]),罪恶与荣耀(“要么写出伟大的著作,要么去死!”[W,第76页])的双重过程就这样在《逻辑哲学论》中获致结论:救赎以弃绝做代价,最终强化了恶。《逻辑哲学论》的骄傲,一如它的虚弱,成为恶的见证。意图与努力、人与哲学的不一致,一方面致使《逻辑哲学论》成为反讽之作,另一方面,正是在沉默之中,它们达成了一致:无声的行动与弃绝,而弃绝也昭示着无声,沉默因而是必然的。

《逻辑哲学论》是本孤寂的书,其中是同样孤寂的哲学,就像它的作者一样。不论作为行动还是作为行动者,这都不免让人疑惑,因为行动必定引发动作,而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者决不是孤独的。《逻辑哲学论》显然已成为死胡同。不过,那也是绝处逢生的开始,因为问题的各个方面因此而被启示:如果伦理与宗教不限于断言或纲领,如果哲学不再是哲学,尤其是如果这一切无一不被保持,但却被禁止保持于理论之中,那该如何去做?就这些问题而言,《逻辑哲学论》的解答可以说异乎寻常,更可以说它用异乎寻常的解答拒绝了解答。

二

显而易见,“转折”已势在必行,与此同时,“转折”已经开始;维特根斯坦宣称自己已解决了所有问题,从而开始了“新”的生活:整整六年,他置身于奥地利一隅!这个行进中

的反讽充满着悖论的意味：维特根斯坦认为问题业已解决的地方，问题才刚刚被启示，而当他抛却哲学问题，进入实在时，哲学问题正以最为尖锐的方式呈现无遗，并且，正是此种姿态成为问题解决的开端。相对于他的早期哲学，这姿态已构成反讽；相对于他后期的“行动”，他“可见”的转折堪称真正转折的开端。那是行动的先导和象征。

惟其如此，理解起来才更为困难。因为失衡的《逻辑哲学论》是一个硬壳，它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哈姆莱特的独白：“噢，上帝，我可以被拘于方寸之内，但我仍是无限之王。”现在，将其打碎，或重新在张力之间保持平衡成为维特根斯坦全部努力的关键。在此意义上，“转折”无非支点中的一个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：“对哲思中的我而言，常常变换姿态是重要的，这样就不至于使一条腿站得太久，从而变得僵硬”（V B, 1937年）。当然，如果不去变换支点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；如果变更支点，支撑者依然未变，因此，转折在被确认为转折的同时，也是连续性的一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维特根斯坦由早期到晚期是从伦理走向宗教，那严格说来转折并未发生，因为依据《逻辑哲学论》中的划分，它们隶属于同一层面；如果沉默被沉默的掩埋取代，那同样不是转折，那毋宁是对沉默更为忠实的承继。真正的转折是那种姿态，以及紧随其后的行动，因为重要的并非他是否在信仰或信仰什么，而是如他所言做（tun）了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毋须知道也根本不知道维特根斯坦的转折是否发生于某一时刻，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否可以将其称为“启示”。我们只知道其行动，我们知道的也只有行动；正是其行动开始具备宗教的性质，它为对上帝的无限敬畏所表征。也可以说，这是其真正“救赎”的开始，甚至完全可以反讽地将其比之于保罗“通向大马士革的道路”，当然，也只能是反讽意义上的比拟，因为无法确知他的宗教信仰，也因为行动的肯定性与表达（对宗教的表达）的否定性同时开始。即便如此，宗教的种种元素却因此得以启示，正是这一点注定了其转折的革命性，及随之而来的困难。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那位乡村教师六年的“操练”堪称嗣后漫长生涯的预演，它近乎寓言般地提示着后面的一切，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，他重回“哲学”只是一种“移植”，将其操练由奥地利乡村移植到了剑桥！几乎与此同时，维特根斯坦开始了他对犹太身份的认同，这决非偶然。这未必有助于确定其信仰的性质，却无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
现身于“连续性”中的转折也注定了它的困难。需要开口说话，但同时，沉默仍在继续，并且更其深沉；使行动在思想中延续，同样还要使思想留存为思想；实现宗教的事业，却将教义隐去，或佯装不知，或真的不知，这并不重要。（“我以前从未信奉上帝——这我知道。但这并非‘我以前从未真正信奉过他’。”[V B, 1946年]）重要的是，如果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转折无非再度回到哲学，或者说，他只是将操练移植到哲学之中，那问题将变得简单，那样的话，因《逻辑哲学论》而来的悖论将再次出现，而维特根斯坦对“唯我论”的消解成为消解此种悖论的范例，或对因随《逻辑哲学论》而来的断绝所做的连接：“唯我论”是其划界功利性即其伦理努力的一部分，而后期同等性质（宗教）的努力正是开始于对“唯我论”的消解：“我”被消融于我的行动之中！

但是，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回归决非单纯，它更应被视为对哲学的革命，或者说，救赎展现为摧毁，而后者成为行动，或行动的极致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，那是一场战斗（“只要留在宗教之中，我们就要战斗”），不仅如此，为使无谓的言说展现为无谓，所有被弃绝的一切

无一不是救赎的对象。因此，从最为“自明”的数学到最“隐秘”的心理学，他后期的行动几乎无所不包，甚至可以说，无处不是他的战场，而贯穿其中的正是语言。“患病”的语言不啻维特根斯坦的沙漠，那是魔鬼出没的场所，是诱惑和抵御诱惑之地，一句话，语言成为“原罪”。维特根斯坦的悖论被出人意料地做了置换：他可见的行动对应着不可见的言说，并且，语言“原罪”与他可恶的思考联系在一起。这意味着，他针对语言并在语言之中展开的战斗，既是其“出埃及记”，又是他的“天路历程”。这一悖论在要求着行动的同时，也要求着行动的真实与行动的超越，反过来，这同一种要求对行动者也同样地适用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那位乡村教师并未消失，他与另外的一极，即思想中的行动并行不悖，但前者已然隐于幕后，可见的只有思想，就如同思想中的变化：早期假定性的框架（诸如“从永恒的观点”）成为框架的假定性（“语法乃是一种逻辑类型理论”），与之相应，真实的维特根斯坦为象征的维特根斯坦，也即语言行动的承担者所取代，而象征的维特根斯坦为象征的含混所取代。与此同时，个人时隐时现，因为对恶的思考使他成为隐身者（“你不要为自己画像”），而对真实的寻求，或意欲实现真实使他如在目前。维特根斯坦以他独具的方式，命中注定要摇摆于欧洲人与犹太人、个人与象征的个人以及哲学家与反哲学家之间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一个真正的宗教思想家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”（V B, 1948年）。正是在这里，早期那种真实与象征的“双重性”开始获致其最佳表达。

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来说，这种摇摆贯穿于其战斗之中。他的方法也受制于这同一种逻辑，因此，维特根斯坦方法的计谋成为方法的必然性，这使得哲学与方法如同一体。这一点被淋漓尽致地展示于其语言行动之中，同样也使悖论只能在暂时性的差异，诸如行动的对象、方式及方法以及行动的担承者中行使力量，事实上却很难实施区分。

三

依据维特根斯坦，语言正以其“魔力”或其“神秘化使用”占据着尼采以后的“世俗性”真空，以致“一整个神话寄身于我们的语言之中”（PO, 第198页），因此，为了不再在“偶像缺失的地方树立偶像”（“哲学所做的一切均在摧毁偶像。这意味着不要再制造新的偶像，诸如在‘偶像缺失的地方’”[PO, 第170页]），语言必须重新回归“世俗化”，回到它的“日常用法”，从而规避其“空转”，也就是说，“让我们成其为人（*Lß uns menschlich sein*）”！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这句口号更能体现出对上帝的敬畏，但也没有什么能比它更为含混（其危险一如胡塞尔的“回到事物本身”）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其目的何在？有无标准？况且，“日常语言”指什么呢？尼采的“群氓”或海德格尔的“常人”所操的语言吗？还是弗雷泽的野蛮人使用的语言？抑或仅仅是个托辞，以摧毁哲学，或传达上帝的指令？不仅如此，“游戏”是具体的，这注定了其有限性，与此同时，游戏又是“生活形式”的一部分，因而是无限的。这个悖论似乎在向他《1914—1916年笔记》中的“泛神论”致意，但另一方面，正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才注定被诱惑：如果说这是其“语法”的一部分，那么它显然不是其信仰的一部分，维特根斯坦深藏不露的信仰由此可见一斑。

行动并非判断，更兼就价值判断而言，其整体判断的毋庸置疑对应于局部的毫无判断。这隶属于其逻辑，也注定了其危险：尽管无神时代的读神无异于捍卫可能的神祇，因为神不可

能被伤害，但相对于其初衷，敬畏正滑向潜在的渎神，驱魔人开始成为魔鬼的兄弟。除此之外，被注定的还包括其行动的内容：组成哲学的无非“疑问与戏谑”，舍此无它！正因为如此，误解注定是其哲学的一部分，而非来自外部

在同等意义上，维特根斯坦行动的性质注定了其方法的“描述性”，而不是相反。描述意味着置身局外，同时又置身其中。它一方面将断言悬置，或使其假定化，从而呈现生活，而非判定生活。不仅如此，持着于现象的他，也将一切展示为现象，以免于被现象的“深度”所诱惑，就像胡塞尔那样。事实上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，理论被分解为理论的张力，从而分解了理论，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也因此被取消，行动或战斗取代了一切

有鉴于此，“确定性”决非偶然地成为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晚期所关注的主要问题。如果全部人类的知识，包括对知识的信仰，都是不确定的，那么其反面即信仰便应该是确定的。或者说，应该设想，那是确定的，因为任何可资辨明的确定都是不确定的，那么，这种“设想”是信仰的一部分吗？抑或是沉默的一部分？如果继续持着于这个无人地带，维特根斯坦的努力注定将成为反讽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他对哲学家与常人做了区分：只有哲学家在误用我们的语言，而常人却不会。似乎哲学家被符咒罩住，一旦离开这个魔圈，就像在恶梦中被推醒一样，他们就将回复正常，并成为为人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：“哲学问题的解决类似于童话中的礼物，后者在魔幻城堡中看去让人迷醉，但将其置于外面的日光下观看时，它无非一块普通的铁而已（或类似物）。”（V B, 1931年）不难看出，童话在此显然不止于譬喻；维特根斯坦隐秘地袭用了童话的机制。这与他漫长而无望的战斗恰成对比

作为观察者的战士，早期维特根斯坦曾表达过愿望，希望能与死亡“面面对”，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成为一个“体面”的人，而在后期，作为战士的观察者，他再一次提及这种愿望，他说：“英雄是直视死亡的人，是真实的死亡，而不单单是死亡的图画……一个戏子可以扮演大量的角色，但末了他自己必定作为人死去”（V B, 1946年）那么，是否应把维特根斯坦视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之一，就像他的同时代人 T. E. 劳伦斯那样？如若不然，是那不是真实，还是不应将其看作真实？抑或一个双面的“雅卢斯”根本不足以成为行动的典范，或行动的引领者？维特根斯坦有一次表达了对自己的困惑：“我就像个孩子，常常想着的只是游戏而已”（W, 第 286页）事实上，也许正是这种完全的无指向性使其思想成为精灵，从而构成影响未来的力量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应该设想，始终沉默的维特根斯坦是有道理的。

参考文献

- PQ: *Philosophical Occasions 1912–1951*, 1993, Indianapolis & Cambridge,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.
RW: *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*, 1984, edited by Rush Rhees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TB Ludwig Wittgenstein, 1984, *Tagebücher 1914–1916*, Werkausgabe Band 1, Frankfurt am Main, Suhrkamp.
V B Wittgenstein, 1984, *Vermischte Bemerkungen*. Werkausgabe Band 8, Frankfurt am Main, Suhrkamp.
W: *Wittgenstein*, 1983, Frankfurt am Main, Suhrkamp Verlag.

(作者单位: 厦门大学哲学系)

责任编辑: 鉴传今